

像毒打野狗一般后的自动招供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29)

就像罗马和长城皆非一夜可成一样，马歇尔的法律事业是起步维难的。他在 1933 年夏天从“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就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接受“霍华德大学”法学院系主任庞恩德的全额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第二个选择是回老家巴尔的摩市，开设律师事务所，养家糊口，等到经济基础稳定后，再从长计议。

马歇尔选择了后者。选择后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为了自己的学业，母亲和妻子都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自己觉得实在是应该有所回报才对；第二，“马里兰州大学”至今尚且顽固地拒绝接受非洲裔美国人学生，对马歇尔来说，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第三，马歇尔要向世人证明他并不比在白人学校毕业的法律学生差。

要将“马里兰州大学”送上审判台，一直是马歇尔心中的一个愿望，他已经无法再去等上几年，才去采取行动。未来的计划定好了以后，首先要取得马里兰州的律师资格，这对马歇尔来说，乃手到擒来之举也。1933 年 10 月 11 日，在第一次考试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认证后，马歇尔宣誓成为了马里兰州的律师。

马歇尔虽然成为了律师，但是对于律师业务的经营之道，却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为了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他拜访了在巴尔的摩市开办法律事务所多年的老前辈沃纳·麦吉恩(Warner McGuinn)，向他请教业务上的秘诀，顺便看看能否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谋个一官半职，作为自己法律业务的起点。

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麦吉恩，别看他个头很小，却是一位趾高气扬，势利现实，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家伙，马歇尔去见他那一年，麦吉恩已经是一位 60 开外的老人了。

马歇尔刚坐下，还没开始喝麦吉恩的秘书送过来的咖啡，就碰了一鼻子的灰。马歇尔才一张嘴，麦吉恩就将他的话语打断了：

“小伙子，算了吧，你就节省点自己的时间吧，也好让我的耳朵歇一歇。打从你一出生，我就认识你。我对你在霍华德法学院的一举一动，也都了如指掌，你学业之好，的确是没有话说。可是如果想凭着几句甜言蜜语，就要来牵我的鼻子，对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你必须自己出去闯荡天下，有了成绩以后再回来找我谈条件。”

麦吉恩虽然有意地打击马歇尔的积极性，但却答应了从旁协助他将律师事务所开办起来，并介绍一些小案件给他去历练和办理。马歇尔走出了麦吉恩的办公室后，第一句对他的直觉就是：好一个不通情理的狗娘养的家伙！

麦吉恩的法律事务所是在巴尔的摩市中心的“凤凰大厦(The Phoenix Building)”，当年所有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律师，几乎全集中在这栋建筑物里。马歇尔在麦吉恩的帮助下，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租了一间最小的房间，作为开业之用。马歇尔的父母，为了祝贺自己儿子的律师事务所开业大吉，特意地从自己家的客厅里，卷来了一张老旧的地毯，作为贺礼。

麦吉恩借了他一套旧桌椅，另外送了他一台旧电话，就是如此简陋的“瑟谷德·马歇尔律师事务所”于然诞生面世。马歇尔的律师业务干得并不怎么样，所办的案件，不是偷，就是砸，再不然就是成立公司或是分居离婚，这些案件使马歇尔有点心灰意冷，即使是办得很好的案件，可是在兵荒马乱的经济萧条时代里，基本上是没有人有钱来支付他的律师费。

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的年代，做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律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白人是绝对不会聘请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律师为其辩护人的，而非洲裔美国人的重大刑事案件，又不相信非洲裔美国人律师有能力救得了他们，他们夹在种族群众中间，前后不得，靠天吃饭。

1933年，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开始，没有什么行业是蓬勃的，整个巴尔的摩市的失业率高达25%，马歇尔从自己6楼的办公室朝着大街望下去，看到一条长长的人龙排队领取政府发放救济的面包时，他就有点后悔，当时应该接受“霍华德大学”法学院系主任庞恩德的全额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

几个月的律师业务经营下来，马歇尔的律师事务所累积了3千5百元的债务，他连每天的午饭钱都掏不出来，只好不是面包夹花生酱，就是靠从家里带来的剩余饭菜维生。

有一天，一位操着乡下口音的非洲裔美国妇女，来到了马歇尔的办公室，点着名要找“瑟谷德·马歇尔律师”，说她有了法律麻烦，需要能干的马歇尔的帮助。马歇尔听后，精神为之一振，误以为生意终于来了。但是等到她开口确认是否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时，就把马歇尔弄糊涂了。

马歇尔一头雾水，急问其故。这位非洲裔美国妇女说，她跑去问巴尔的摩的法官，如果自己没钱但又需要律师的话，该怎么办呢！那位幽默的法官笑着告诉她说，那只有找马歇尔了，因为他是“又好又免费”的。马歇尔一听，就知道是白人法官在拿自己来穷开心，被气得都笑了起来。

其实办办小案件是马歇尔用来养家糊口的临时策略，这并不是他的志愿。他发现与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浪费时间，倒不如答应恩师休斯顿之邀，二度深入美国南部诸州，继续为“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做关于黑人学校实际情况的实地的考察和研调，作为铲除《吉姆·乌鸦法律》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样来得更有实质的意义。

休斯顿这次带着摄影机和马歇尔两人，深入弗吉尼亚、肯塔基、密苏里、田纳西、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密西西比等州，将非洲裔美国人中小学校的悲惨境遇，纤悉无遗地记录下来。马歇尔和休斯顿两人给“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写的调查研究报告书，是坐在汽车里，将打字机架在膝盖上一字一字地敲出来的。

他们发现这些美国南方诸州的非洲裔美国人小学的环境，可以用“无法忍受”四个字来形容，由于经费短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些木料建筑物，大多数的课室，都可以透过霉烂的天花板看到蓝蓝的天空，下雨时，则外面下大雨，室内下小雨，而课室的地上，则是泥泞四处，无法落脚。

在三十年代，两位黑人，光天化日之下，只身跑到美国南部诸州去调查研究关于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政策的行为，那意味着是在与死神开玩笑，因为随时都有被“三K党”暴徒私刑处死的可能。当马歇尔和休斯顿二人在密西西比州作调查研究时，就接到了有生命危险威胁的警告，“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驻密西西比州分部的负责人不敢大意，在当地的殡仪馆里，特别请了两位体格强壮且有力气的黑人，背着长枪，全天候寸步不离地保护着他们。

这趟美国南方之行，彻底地改变了马歇尔和休斯顿二人之间的关系。两人已经超越了师生的关系，变成了朋友、知己和工作伙伴，这倒是马歇尔的一个意外收获。整个行程，马歇尔和休斯顿就美国的过去和未来的种族问题，反复不停地讨论。

休斯顿认为，美国政府目前所执行的“隔离但公平”政策，完全是一种诈欺行为，因为在白人掌控下的政府，是不可能达到对黑人完全的公平原则的，他们亲眼目睹的实际景象，就是最佳的证据。

休斯顿认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智慧与天赋，绝对不差于白种美国人，只是环境加条件，造就了目前的黑白学童之间的差异，如果将他们混在一起教育，那就会证明他是正确的，多少年来，他对于这种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无日不觉如芒在背，誓与之不共戴天。

马歇尔亦有同感，他很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公不义的种族歧视制度一天不去，这个国家将永远算不上是一个现代文明之国，也永远会因为整个社会充满了暴戾之气而永无宁日。

所有的罪魁祸首就是害己害人的《吉姆·乌鸦法律》，而要结束这种毒祸整个美国社会与民族精神已经半个世纪的《吉姆·乌鸦法律》，靠游行示威，靠以牙还牙，靠冤冤相报，是治标不治本，没法从根本上来解决真正的问题。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不是法律歧视人民，而是权势凌驾于法律之上，反动压倒真理，要纠正这种时代错误的方法，而且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诉之以法，服之以理，屈之以威，折之以正，待之以诚与感之以爱。

马歇尔从中学时，就对《美国宪法》倒背如流，深感这部人类第一部的成文宪法，已经被后代的阴谋家们扭曲和误导，只要能拨乱反正，只要能实际执行之，一切的牛鬼蛇神，一切的乌烟瘴气，将会自动的销声匿迹，将会自动地灰飞烟灭。

马歇尔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一直亮着红灯的。他哥哥奥布里虽然当了医生，还在巴尔的摩市的凯里街(Carey Street)有了自己的医疗所，但是一来由于经济大萧条，二来因为他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在那个年代，美国白人是绝对不会相信一位黑人医生的。

奥布里的业务范围，也就只能局限在当地贫穷的黑人社区里，而当时的黑人，是不习惯花钱在私人医生身上的，这样一来，他的收入，也就极其有限了，奥布里迫于无奈，只好到巴尔的摩市政府里兼差，才勉强地将家庭支撑下来。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段遥远距离的。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尽管马歇尔当了律师，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并没有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

巴尔的摩市的杜吉德希尔大道 1838 号(Queued Hill Avenue)是一栋老房子，虽然有 5 间房间，但只有一间浴室。奥布里夫妇两人，加上刚出生的小男孩，另外他老岳母也挤在这里凑热闹，再加上马歇尔自己两口子 and 双亲，一家总共 8 口人，就是每天生活在这里，家人之间的小磨擦，无日无之。

马歇尔的母威廉斯是整个家庭的灵魂，也是整个家庭的主心骨，如果没有她的把持主事，这个家早就七零八落地散掉了。老太太在家里的权威，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每天由谁先用浴室，到吃什么晚饭，全由她说了算。

马歇尔父亲酗酒的老习惯，给全家带来了不少烦恼。但是令马歇尔真正烦恼的，并不是他父亲的酗酒习惯，而是自己妻子伯雷的习惯性流产，这使极度想要个儿子的马歇尔有着相当难以言喻的失望和不快。

伯雷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知道自己丈夫的艰难处境后，毫不犹疑地走出客厅，跨出大门，四处工作，她从不计较职业，无论当店员、卖帽子、摆地摊、送杂货，都是敬业如一，深得邻居和朋友们的好评和尊重。

伯雷吃苦耐劳，无怨无悔，她有着坚持原则，不向恶劣环境低头的好个性。有一次，伯雷替一间广告公司工作了两个月，但只拿到了两个星期的薪水，她觉得受了委屈，要马歇尔替她到法院去起诉那家广告公司，要求赔偿。

但是马歇尔认为一来这点儿小事，不值得他去浪费精力，二来自己实在是有点懒惰，就找个理由推掉了。伯雷二话不说，自己写状自己告，说什么也要争个公道，讨个说法。她本来就是理直气壮，老法官在判决她胜诉后，忽然问她：“咦？我们的马歇尔大律师为什么不替你来告他们呢？”她不加思索就据实回答道：“因为一来他很懒惰，二来我没有钱付他的律师费。”这个答案，逗得老法官和旁听席上的人，前仰后合，笑成了一片。

经过了一段过渡期，马歇尔的律师业务略有起色，由于他个性温和，谦恭有礼，许多法官都愿意将一些案件介绍给他，除了离婚、债务、车祸等的民事案件外，他也开始接受强奸、谋杀和种族歧视等刑事案件。

马歇尔在执业律师后的第一件涉嫌谋杀凶案，给他带来了第一次要独当一面地去全程办案的经验，但也带来了一次灾难性的信心打击和无情的考验。1934年年中的一天中午，马歇尔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他的邻居派特·派特逊(Pat Patterson)的紧急电话，说他的朋友有一位25岁，叫做詹姆斯·高路斯(James Gross)的儿子，刚在马里兰州的南方，被司法当局拘捕，并控以一级谋杀罪名，他向朋友大力推介马歇尔，认为他是此案的最佳律师候选人，请他出面为其辩护。

马歇尔接案后，经过了解实情，发现事情是这样的：高路斯与另外两名同案犯，都是马里兰州恶名昭彰的黑帮首领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的手下，这三个人，平常除了好事之外，几乎是没有什么不干的勾当。由于他们三个家伙的罪行累累，报纸称之为“迪林格三黑(Three Black Dillinger)”。

“迪林格三黑”专向小本经营的劳苦大众下手，这次的抢劫对象，就是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摆烧烤小摊的小贩。当他们下手抢钱而那位小贩胆敢反抗时，两支手枪同时对准了那位小贩喷出了致命的火焰，小贩立即横尸街头。

高路斯在这件犯罪中的角色，是负责把风和开车，虽然有分钱，但是没有动手杀人。所以马歇尔的辩护策略，不是想使高路斯无罪释放，而是希望他能越过鬼门关，不要被全是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布死刑。

案件在充满了种族歧视的马里兰州上马尔伯勒郡(Upper Marlboro)开庭，没用几天就草草结束了。马歇尔用尽了力气来告诉陪审团，他的代理人只不过是案件的开车司机，并没有动手杀人，因此不可与另外两位嫌疑犯同罪。

可是陪审团并不同意马歇尔的理论和说辞，宣布三位被告的一级谋杀罪名全部成立，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全无生路，必然会被法庭判决死刑。1935年4月19日午夜，高路斯在马里兰州监狱(Maryland Penitentiary)内，被当局依法执行吊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马歇尔的代理人死了，但是另外一位同案罪犯，就是真正动手开枪杀人的唐纳德·帕克(Donald Parker)，却在几个月后，被改判为终身监禁，原来帕克的辩护人是一位交际广泛的白人律师！

马歇尔心中的不忿与难平是可以想象到的，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反而逃出了生天，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司法体系？人类的肤色，难道就是决定法庭判决的重要因素吗？

这是马歇尔第一次对马里兰州的司法系统感到厌恶和反感，但却不是最后一次。两年后，马歇尔又受到另外一次更大的冲击，不过这次的冲击，是正面的，是激励人生的，是柳暗花明的，那就是马里兰州的《沃特士·卢克斯案(Vertis Lucas Case)》。

这是一件谋杀案，而且是一件涉嫌黑人谋杀白人的敏感刑事案。事情是这样子的，在高路斯被吊死后的两年，“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马里兰州分部，邀请马歇尔来处理一件他们认为是特大号的冤狱案件。

马歇尔接手后，稍微了解案情，就同意了“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驻马里兰州分部的分析和意见。卢克斯是一位年青力壮的非洲裔美国人，他忽然在巴尔的摩市被马里兰州治安当局拘捕，并控以一级谋杀海曼·柏林安特(Hyman Brilliant)的刑事罪名，而死者柏林安特是一位白人。

巴尔的摩市的警察将卢克斯拘捕后，首先把他疲劳审讯长达三天三夜之久，加上像野狗一般的不停毒打，终于胜利地宣布卢克斯已经“自动招供”。但是巴尔的摩市的警察并未因为卢克斯的“自动招供”而将之“坦白从宽”，放他一马，却把他屈打成招的“自动招供”做为证据，将他以一级谋杀的重罪起诉。

马歇尔首先带着他当医生的哥哥，到监狱里为卢克斯做了一次全身的验伤检查，并录取了他如何被巴尔的摩市警察毒打成招的全程口供。马歇尔对天发誓：绝不允许再将卢克斯吊死！

面对着全是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马歇尔将他在读书时期所练就的演讲口才发挥得淋漓尽致。马歇尔毫不隐瞒地说出种族歧视在这件屈打成招案中的非法角色，有力地陪审团出示了卢克斯在被捕后遭受到不人道的虐待和毒打，并将一大叠陪审团看完了的医学报告与毒打证据，摔在检察官的面前，使之哑口无言，无话可说。

马歇尔义正辞严地告诉全是白人的陪审团说，卢克斯是一位弱智的人，在案件发生时，他刚好在命案现场附近玩枪，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也就没有逃离现场的行为，正因为他是一位弱智，又是个黑人，才符合了无能的巴尔的摩市警察找不到真正的凶手，无法交差而栽赃嫁祸给卢克斯的条件。

整个陪审团，无一不被这位口若悬河而且一身正气的年轻黑人律师所感动。他们一致裁决，卢克斯的一级谋杀罪名不成立，但是“过失杀人(manslaughter)”罪名却是成立的。由于审案的法官觉得巴尔的摩市警察的确是太不像话了，故轻判卢克斯入狱6个月了事，这对马歇尔来说，在《吉姆·乌鸦法律》横行的年代，一位黑人谋杀了一位白人而不被吊死，就是一场全盘大胜的战役。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马里兰州分部对于卢克斯之不但没有被吊死，而且在一个黑人年轻律师面对着全是白人的陪审团的挑战下，居然只有六个月刑期的判决结果，简直是无法置信。这是马歇尔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首次合作，这种超然的胜利，为他们之间未来的长期合作，奠定了稳定、互信而扎实的基础。

另外一个使“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兴奋的理由，就是从卢克斯的案件里，他们知道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黑人律师，一样可以在白人的司法系统里，成功地为黑人罪犯辩护，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先例，是非洲裔美国人可以走向美国主流社会的试金石信号！

在三十代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马歇尔成了司法界的一个异数，一朵奇葩，他开始广泛地结交各层次的人物，由法官到检察官，由市井小民到地痞流氓，他都与之友善，几年下来，马歇尔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位倍受各方敬仰和敬重的著名刑事诉讼律师。

马歇尔的心胸宽阔，眼光独到，使他在巴尔的摩市中的非洲裔美国人律师中特别的出类拔萃，他老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他在一生中，总是不停地开创新记录，超越旧历史。成功是为有准备的人提供机会的，马歇尔成名的机会来了。这在他的律师生涯的第三件案件中，就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为一位白人辩护，而且是为一位本身就是律师的白人在辩护。

事情的起源，还是与种族歧视有关。中国的李宗吾，乃一代怪杰也，他除了创出了名传千古的《厚黑学》外，还创有另外一种理论，他说这世界上事情，可将之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能说不能做”，一种是“能做不能说”。而马歇尔所操作的案件，就是一件“能做不能说”的事情。

伯纳德·艾德斯(Bernard Ades)是一位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执业律师，他在一件为非洲裔美国人客户的谋杀辩护案件中，由于他认为美国法官威廉·考德威尔·库尔曼法官(US Judge William Caldwell Coleman)持有种族偏见，所以才导致了他代理人的罪名成立，于是他对新闻记者表达了他的见解。

库尔曼法官知道后，怒不可言，认为这是对他人格和专业的双重侮辱，决定要查办这个口不择言的律师，于是他安排采取了法律行动，开庭审判要吊销他的律师执照。

库尔曼法官于1884年10月17日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Louisville)出生，190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后，从1909年至1927年，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为执业律师。从1914年至1917年，为“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1927年12月6日，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提名他出任新增设的美国法官职位，美国参议院于1927年12月19日早上通过了他的提名，当日下午就将委任状交到他手里。

1948年至1955年，库尔曼是美国马里兰州美国法院的首席法官。他于1955年6月1日辞职退休，于1968年1月12日病逝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享年84岁。

由这些背景中可以看出，艾德斯在背后对他指手画脚，会带来什么样子的麻烦。艾德斯没想到自己替别人辩护，最后辩护得自己变成了被告，无可奈何之下，他找到了马歇尔的前法学院教授休斯顿求救。休斯顿想了一会，回答艾德斯说，他是可以接这个案子的，但唯一的条件就是要马歇尔一起来办理，艾德斯同意之。

库尔曼法官得知了休斯顿和马歇尔两人是艾德斯的联合辩论律师后，把他们师徒二人叫到他的法官办公室里，当面告诉他们说，他之所以要查办艾德斯，是因为他在公开的场合，不公平与不负责任地批评他是一个有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的法官，这已经严重地败坏了他的名誉。

库尔曼法官又郑重其事地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两人还是要在法庭上做出类似的指控的话，那么，他一定会以“藐视法庭(contempt of the court)”的罪名，让他们尝一下马里兰州监狱的味道。

这样一来，休斯顿和马歇尔两人立即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局面里：他们接这件案件的大前提，就是要在法庭上来证明库尔曼法官在那件谋杀案中的判决，是受了种族偏见的影 响，如果不允许他们在法庭上来指控库尔曼法官的话，他们则无事可做了，案件则必输无疑。如果他们按照正常程序来办案的话，那么，他们两位辩论律师都会因为惹火了库尔曼法官，而面临着坐牢的风险。

这种两难局面的流言，立即传遍了巴尔的摩市，大家都在屏息以待，静观其变，看看这场美国司法史上首次的美国非洲裔美国人律师与美国白人法官角力的好戏，会如何来收场。足智多谋而且从不向黑暗低头的马歇尔，又成了新闻界瞩目的焦点。

马歇尔事后回忆说，正当他和休斯顿进退不得之际，他的一个叫做约翰·墨菲(John Murphy)的老主顾突然来找他，见面后就给交给了马歇尔一个信封，然后说，“你一定可以出庭辩论的。”马歇尔打开信封一看，整个人惊呆了：信封内装有五张一千元面额的现钞！墨菲接着说：“这是你从监狱里出来的保释金。”

当马歇尔在1933年取得了律师资格时，曾向在巴尔的摩市的老律师前辈麦吉恩请教生意之道。麦吉恩讽刺他说：“小伙子，我根本不在乎你会抢走我的客户，就算把客户给了你，客户也会很快地就再回到我这里，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根本就玩不转。”言罢，眯着眼睛，朝着马歇尔露齿而笑，马歇尔被羞辱得满脸通红，也气得七窍生烟。

麦吉恩为了显示自己的信心，特意将《非洲裔美国人报(Afro American)》的墨菲介绍给马歇尔，让他办点小案件糊口。实际上马歇尔与墨菲是有着私人关系的，他的侄子詹姆斯·墨菲不但是自己当年在“林肯大学”的同学，还是住在一起的同室好友，马歇尔与伯雷在费城结婚时，詹姆斯·墨菲就是自己的伴郎。马歇尔成为律师后，詹姆斯·墨菲大力向他叔父约翰·墨菲推荐了马歇尔，亦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由于马歇尔为人谦虚有礼，办事认真，使墨菲对之印象良深，逐渐地将自己大部分的业务，都交给了马歇尔去处理，并且没有再回到麦吉恩办公室那里。后生可畏，老马失蹄，大意丢荆州，这也是数次夸下海口的麦吉恩没有想到的结果。

马歇尔握住这位《非洲裔美国人报》发行人的手说：“我一定全力以赴！”马歇尔决定要在马里兰州的法庭上，打上一场正义之战，打上一场原则之战！莎士比亚有句名言说：“有胆量的人，最先获得冠冕。”就在马歇尔全力以赴地准备出庭抗争之际，事情发生了变化：库尔曼法官自己也觉得这种自告自判，又加之恐吓对方律师的行为，的确是有点过份了，况且在法理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所以库尔曼法官就以“利益冲突”为理由，自我回避，并且主动地将整个案件转交给了另外一位美国法官来审理。

一场法庭官司下来，马歇尔大胜，新接手案件的美国法官，判决艾德斯应该得到“口头申戒”，要他身为律师，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但同时也拒绝了库尔曼法官要法庭吊销艾德斯律师资格的要求。

这场官司下来，除了艾德斯保住了他的律师执照外，马歇尔是最大的赢家。一位黑人律师，而且是一位年轻的黑人律师，居然为一位白人，而且是一位白人律师辩护，更在白人的司法体系里，在白人的法庭上与白人的法官对抗，结果居然取得了如此伟大的胜利，这意味着什么呢？

马歇尔像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非洲裔美国人中的拔尖律师。虽然是一登龙门身价重，但是个性温和而且谦恭有礼的作风，使马歇尔与各级法官、官员和检察官等，都有着良好的关系，而且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尊重和推崇。

库尔曼法官的案件，是马里兰州司法界的一道分水岭，案件本身的象征意义，已经超出了法律的层次，它为所有的马里兰州白人法官敲了一个警钟：不要搞种族偏见，或是公诸于众。整个马里兰州的司法风气，因马歇尔的努力开始有了大幅度的改进。

有许多白人法官，非常害怕被辩护律师或者新闻界贴上“种族歧视”或“种族偏见”的不光彩的标签，多设法避免之。在众多的策略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替嫌疑犯找一个优秀的黑人律师，这足以封住天下悠悠之口。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往往成了最佳的人选，他经常被白人法官请去作人证和顾问，这更使马歇尔声名大振，远近闻名。

马歇尔是一位行事谨慎而且要求完美的人，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起诉书、答辩状里，都是如此，他公平合理，从不做过分的或特殊的要求，他需要的和追求的，只是最基本的公平待遇。

尤其是在文字运用上，马歇尔是极其重视的，他在选写法律文件时，往往为了一二个错字，而不惜整篇重来，务求完美。长此以往，马歇尔办事认真与行书谨慎的名声，不胫而走，成了他的金字招牌，这在当时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里，大多数都是平庸之辈的非洲裔美国人律师中，他更显得有如是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在当时以白人为主的司法体系里，白人律师是看不起黑人律师的，更有些白人律师，为了羞辱黑人律师的书写能力和法学修养，故意在法庭上向法官提出要多点时间，来审查他们的诉状或是答辩书，看看是否合乎标准与要求。

有一次，与马歇尔做对手的一位白人律师，又重施故技，要求一位经常刁难黑人律师的法官把马歇尔的文件交出来，看看他是否有资格来办理此案。那位法官居然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还当庭宣布说：“这是没有必要的，阁下也无须担心这个问题，只要有了瑟谷德·马歇尔先生签的字，那就是表示没有问题。”

马歇尔虽然需要金钱来养家糊口，但并不是毫无原则地胡乱接案。有一个晚上，马歇尔已经入睡多时，忽然接到一位法官的电话，通知他说在马里兰州近郊小镇弗雷德里克(Frederick)那里，一件私刑处死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

那位法官要马歇尔亲自赶到现场之目的，就是因为那里发生了一件警察拘捕一名暴力强奸白人少女的黑人嫌疑犯的事，更想让他监视着已经极度情绪化了的白人警察，以免私刑处死事件发生。

马歇尔开着他那部1929年，还是从他舅舅那里借钱买来的，外号叫做“百思(Betsy)”的福特老爷车，一摇一晃地赶到现场时，亲眼看到了一幕恐怖而混乱的场面：大批的警察到处追逐着拘捕数名非洲裔美国人，搞得鸡飞蛋打，呼天抢地，人人自危，但是由于闲杂人等太多，因而没有私刑处死的突发事件发生。

马歇尔见状，反而开始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起来，他把自己的老爷车，紧紧跟在一部州警的车后，他好不容易拉住了一位白人警察，要求他保护自己，直到他安全地到达法官的家里为止。那位白人警察看了一下这位满身大汗站

在混乱人群中的“黑鬼”，斜着眼角问他：“什么？你也需要保护？”声音和表情，好像是突然看到了一位外星人站在他面前一样惊讶。

事情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位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当地银行总裁的掌上明珠，年方 18 岁的杰拉尔丁·克罗兹 (Geraldine Kroch)，被一个叫做威廉·卡特 (William Carter) 的非洲裔美国人暴力强奸，因为她誓死反抗，结果被卡特毒打成重伤。经过了深入的调查，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证据，都指向了卡特，使他无所遁形。马里兰警方将卡特拘捕归案后，控以“意图强奸并暴力袭击 (assault with intent to rape)”的重罪，提起公诉，这是一条可以被马里兰州法庭判处死刑的重罪。

马歇尔不愿意为魔鬼辩护，拒绝接手这件案子。此案震惊全国，为了避免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带来的不公平审判，“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巴尔的摩市分部与《非洲裔美国人报》联合起来，委托他出来全程观察和监督。审判的结果是所有的罪名，全部成立。可能是由于这是一件敏感性特强的案件的缘故，卡特并没有被预期地判处死刑，而是终身监禁。

马歇尔在法庭宣判后，以“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发言人的身份说，他认为这是一场在司法公正公平下的伸展正义的审判。他在后来给休斯顿的信中评论这件案情时，毫无偏袒地直接说：“威廉·卡特的罪行，像魔鬼一样地罪有应得 (William carter is guilty as the devil)。”。

由于新闻媒体不停地将马歇尔在这件卡特案件中的正直和公平的评论进行传播，使他的知名度和大众形象，超越出了巴尔的摩市，名扬天下，深受马里兰州朝野的敬重。虽然他在巴尔的摩市成了一位权威的非洲裔美国人知名大律师，他与巴尔的摩市的立法机构的关系也相当的友善和互重，但当马歇尔试图要加入全是白人组成的“巴尔的摩市律师协会 (The Baltimore City Bar Association)”时，却受到了他们闭门羹式的藐视和侮辱。

马歇尔对此并不生气，也不搞对抗，他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政治策略。1935 年 4 月，马歇尔连同巴尔的摩市的另外 6 位非洲裔美国人律师，自组“城市纪念碑律师协会 (The Monumental City Bar Association)”，并当选为首任主席兼执行长。

同一年年底，“城市纪念碑律师协会”的成员已经达到总共 38 人，稳稳自成一股政治和监督力量。1935 年，就在马歇尔自组“城市纪念碑律师协会”的同一年，他当选为“全国律师协会”的财务长 (Treasurer, The 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但这是个闲差事，因为“全国律师协会”根本就没有钱财可言，马歇尔曾自嘲地取笑这个虚有其表的“全国律师协会”财务长的职位说：“他们的钱太少了，少到我可以将所有的钱卷起来，放到我的嘴巴里。”

马歇尔是一位有远见和抱负的知识分子，深受他老师休斯顿“律师的责任不只是申张正义，还必须是社会的工程师。”的理念的影响，他不停地将自己的眼光，投射到社会的公平制度的建设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歇尔开始大量地介入巴尔的摩市的社会活动。

由于马歇尔的响亮知名度，导致了許多工会组织主动地前来向他咨询有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在当时的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里，最大的工厂是“伯利恒钢铁厂 (Bethlehem Steel)”，厂里的工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非洲裔美国人，这些非洲裔美国人已经有了工会，问题是他们并不相信这个全是由白人掌控的工会会替他们争取到任何的利益。

1930 年时，“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宣传刊物《危机杂志 (Crisis Magazine)》总编辑威廉·爱德华·布格哈特·杜博依斯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 曾经前来巴尔的摩市，向“伯利恒钢铁厂”的非洲裔美国人工人，发表过演讲，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白人的工会来保护应有的权益。

当时的大部分美国工厂，是不允许非洲裔美国人自设工会组织的，当巴尔的摩市的民权组织要马歇尔帮助非洲裔美国人工人组建工会时，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地应该介入。由于考虑到人身安全和事情的成败，马歇尔采用极其秘密的方法来操作这件事情。

马歇尔成功地安排了“伯利恒钢铁厂”未来黑人工会的各种选举，包括各部门的领导和宗旨。虽然他们尽量采取了三更半夜的开会安排，但还是被“伯利恒钢铁厂”当局发现了，他们认为一个清廉有效的纯黑人的工会组织，将会是他们资方最大的潜在敌人。

既然马里兰州的法律并没有不允许非洲裔美国人自组工会的条文，“伯利恒钢铁厂”就决定用武力来私下处理胆敢出面组织工会的黑人。“伯利恒钢铁厂”当局暗中找来了一批流氓，手拿警棍，领着狼狗，四下巡逻，遇有集体开会的情况，即用暴力驱散，见有前来“教唆使坏”的黑人律师，亦是同等仇视，一律暴力招待。

有一次马歇尔就差点被“伯利恒钢铁厂”的恶棍杀害。那是一个大雨之夜，马歇尔正在“伯利恒钢铁厂”里面和非洲裔美国人工人开会，讨论有关自组黑人工会的事宜。当会议开至一半时，门外的把风者神色匆忙地跑进来报告说，有大批恶棍带着狼狗和武器，气势汹汹而来，大家吓得立即散会，夺门而逃。

马歇尔见此，亦是不敢大意，以免吃了眼前亏，他和同来的一位助理，为了躲开后面的追兵，跳窗而遁，拔腿就跑。离开“伯利恒钢铁厂”后，跑出了两条街，看见前面有一间教堂，教堂外有一片密密黑黑的灌木林，两人不由分说，就跳进了灌木林，趴在泥巴地上，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没有一分钟，“伯利恒钢铁厂”的恶汉们应声而至，一边搜索一边骂道：“一定要找到那个黑狗娘养的！一定要找到那个黑狗娘养的！”马歇尔两人一直趴在泥巴地上，一动也不敢动，直到恶汉们离开后，才敢胆颤心惊地站起来。马歇尔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午夜 12:00 点了，只好带着满身的污泥和汗水，狼狈不堪地回家。

2011 年 4 月 23 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